



晚明史

(1573-1644年)

樊树志 著

下
卷



復旦大學出版社



晚明史

(1573—1644年)

——

下
卷

商务印书馆



国家哲
上海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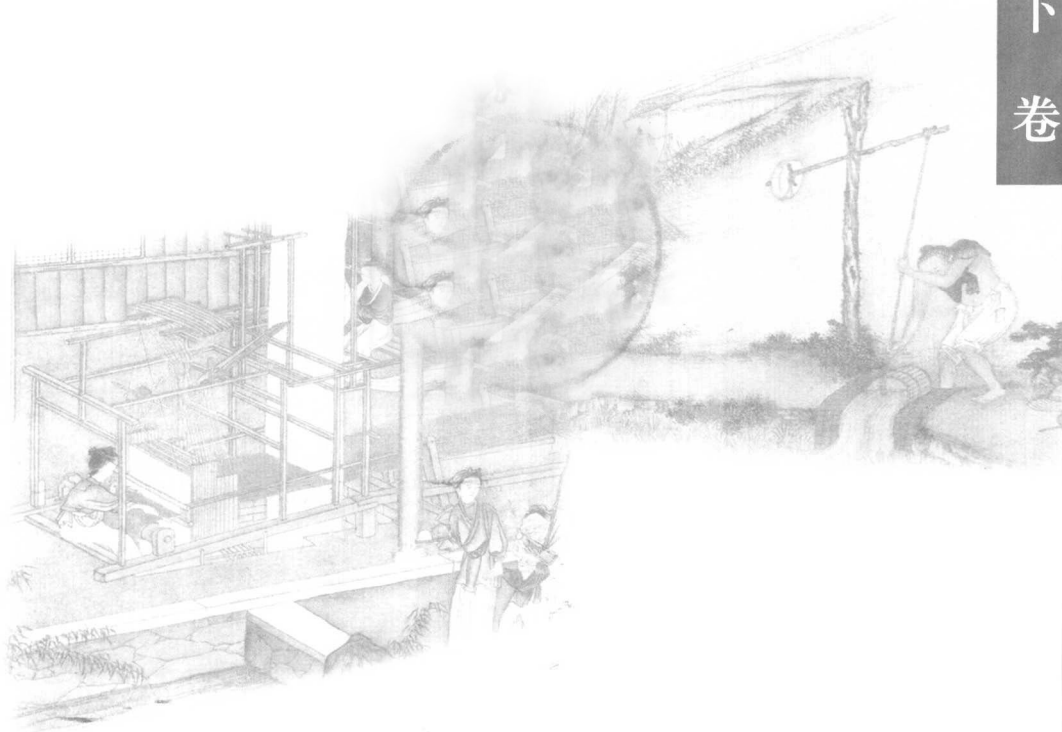
年五
期一

晚明史

(1573-1644年)

樊树志 著

下
卷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明史:1573—1644 年 上下卷/樊树志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10

ISBN 7-309-03746-4

I. 晚… II. 樊… III. 中国-古代史-研究-1573—1644
IV. K248. 3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71786 号

晚明史(1573—1644 年) 上下卷

樊树志 著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86-21-65118853(发行部) 86-21-65109143(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吴仁杰

装帧设计 孙 曙

总 编 辑 高若海

出 品 人 贺圣遂

印 刷 江苏丹阳教育印刷厂

开 本 890 × 1240 1/32

印 张 38.375 插页 11

字 数 1032 千

版 次 2003 年 10 月第一版 2004 年 6 月第二次印刷

印 数 3 101—5 000

书 号 ISBN 7-309-03746-4/K · 123

定 价 60.00 元(全二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下 卷

第七章 从泰昌到天启	629
一、神宗的怠于临朝与疾病缠身	629
二、昙花一现的泰昌朝	640
三、从泰昌到天启的过渡	651
四、天启：畸形的魏忠贤专政时代(上)	660
五、天启：畸形的魏忠贤专政时代(下)	675
第八章 崇祯：清查“阉党”逆案	703
一、受命于危难之际的朱由检	703
二、不动声色逐元凶处奸党	714
三、清查“阉党”逆案	727
四、为东林人士平反昭雪	750
第九章 袁崇焕与毛文龙	760
一、从李成梁到熊廷弼	760
二、从孙承宗到袁崇焕	769
三、同室操戈：毛文龙之死	784
四、己巳之变：袁崇焕的悲剧	797

第十章 “党同逐异,便己肥家”	812
一、“今日吏治民生夷情边备事事堪忧”	812
二、“此时不矫枉振颓,太平何日可望?”	821
三、朝政与党争(上)	
——由会推阁员引发的党争:钱谦益案	833
四、朝政与党争(下)	
——由袁崇焕之狱引发的党争:钱龙锡案	853
五、权力争夺:温体仁与周延儒的倾轧	864
六、温体仁辅政:“崇祯皇帝遭‘温’了”	872
第十一章 民变蜂起:举棋不定的抚与剿	896
一、初起阶段的民变与杨鹤招抚的失败	896
二、战火蔓延山西	915
三、从澠池渡到车箱峡	928
四、洪承畴、卢象昇、孙传庭	947
五、杨嗣昌“十面张网”的成功	970
第十二章 攘外与安内的两难选择	989
一、对清朝和与战的优柔寡断	990
二、“盐梅今暂作干城”:杨嗣昌督师	1006
三、“功虽未成,尽瘁堪悯”	
——杨嗣昌之死	1016
四、“灭寇雪耻”成泡影:洪承畴降清	1028
五、秘密媾和与陈新甲之死	1037
第十三章 “无可奈何花落去”:明朝的覆亡	1045
一、朋党政治与周延儒的复出	1045
二、内战形势急转直下:李自成与张献忠	1076
三、挽救命运的失败尝试:出征、南迁、勤王	1101

四、京师陷落与思宗殉国	1122
五、从大明到大顺到大清的政权更迭	1134
 主要参考文献	 1179
索 引	1195
后 记	1214

第七章 从泰昌到天启

一、神宗的急于临朝与疾病缠身

神宗是一个权利欲极强的帝王，亲政以后励精图治，一度形成了“事事由朕独断”的局面，但为什么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急于临朝呢？这是研究万历朝历史值得细细加以探讨的问题。然而人们的见解很不一致，见仁见智，众说纷纭。

晚明名士夏允彝（字彝仲，松江华亭人）对神宗急于临朝的原因作这样的分析：“自（郑）贵妃宠甚，上渐倦勤，御朝日稀。迨国本之论起，而朋党以分，朝堂水火矣。争国本者章满公车，上益厌恶之，斥逐相继，持论者益坚，上以为威悚之不止也，不若高阁置之，批答日寡。后遂绝不视朝，疏十九留中矣。郊祀不躬，经筵久辍，推升者不下，被纠者不处，上之一切鄙夷也。”^①夏允彝在这里勾画了神宗急于临朝的渐变过程，先是对朝政表现出倦怠之意，上朝的日子逐步减少；以后发展到绝不视朝，奏章也懒于批答，束之高阁。这毫无疑问是真实写照，然而对渐变的原因分析得有点牵强。首先，把神宗“倦勤”、“御朝日稀”归之于宠幸郑贵妃，沉迷于儿女情长，就失之偏颇。如前所说，神宗由于宠幸郑贵妃，在册立皇太子事件上一再与廷臣对抗，从

^① 谈迁《国榷》卷 83，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丙申。

而导致“三王并封”之议,以及“妖书案”、“挺击案”之类政治风波。透过这一系列政治事件,人们可以强烈感受到他始终牢牢控制着局面,他的独断专行、固执己见的秉性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和廷臣一样,都把这些与“国本”有关的事件,当作朝廷头等大事来对待,丝毫看不出由于宠幸郑贵妃、沉湎于酒色而不理朝政的迹象。夏允彝这位与陈子龙(字人中,号大樽,松江华亭人)齐名的“几社”名士,对于晚明史常有真见卓识,然而关于此事的评述难免陷入“女人祸水”论的窠臼。似乎郑贵妃之与明神宗,犹如杨贵妃之与唐玄宗,其实不然。杨贵妃“女人祸水”论前人早已有所澄清,唐玄宗的荒怠另有原因在,郑贵妃等而下之,则更无论矣。神宗的“倦勤”与“御朝日稀”是应该从别的方面寻找原因的。其次,把神宗后期奏疏“批答日寡”到“绝不视朝”,归结于廷臣的朋党之争使他对奏疏与朝政极度反感的结果,显然是本末倒置了。万历一朝官僚队伍中的朋党之争、门户之见,其实是神宗一手造成的。他在倒冯、倒张的风潮中,为昔日反对新政而遭到黜革的官僚平反,重新起用,委以重任。这些人重新上台后,意气用事,力图把万历十年以前的一切全盘否定。于是形成了两派官僚、两种政见的明显对垒。以后围绕着争国本、争册立、争“三王并封”,以及“妖书案”、“挺击案”,使这种对垒更加具有朋党色彩。如果把这种政治斗争看成神宗“批答日寡”、“绝不视朝”的原因,实在是模糊了君臣之间的责任界限,颇有臣子代君父受过之嫌。由此可见,夏允彝的评述没有抓到点子上。

那么,今人的看法又如何呢?明清史的一代宗师孟森在《明清史讲义》专叙万历一朝史事的第五章,标题赫然是《万历之荒怠》,把神宗亲操政柄的几十年称为“醉梦时期”,说神宗“怠于临朝,勇于敛财,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与外廷隔绝”,而把原因归结于“专用软熟之人”为相。这“软熟之人”的魁首便是申时行,因为申时行“遇事迁就,以成其过”,章疏留中,讲筵永罢,都是申时行开的先例^①。香港大学

^① 孟森《明清史讲义》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246、260页。

亚洲研究中心的马楚坚把孟森的论点加以发挥,把神宗的荒怠完全委过于申时行。他说:“及申时行继为元辅,其为祸尤大,万历政弊与其有莫大关系……(帝)欲作解放不受束缚,故‘每遇讲期多传免’,时行不但不匡正此变态心理,反助帝偷学,疏其变态为巨流,并为帝虑一偷懒之法,以‘进讲章(讲义)’代讲授,‘自后为故事,讲筵遂永罢’……又助上怠政,教其将不愿接受之‘章奏留中’,‘毋下其章’。帝自后所以对奏疏不批不发,置之不理,实‘自此始’。又劝帝拒谏,不辨是非……自是以后,神宗遂以此而自由自在,日耽荒逸,纵情声色,饮酒使气,贪财好货为乐。”^①

孟、马二氏所论历历有据,并非臆测。然而神宗的怠于临朝要申时行来承担责任,未免太不公平。申时行为人“软熟”,“遇事迁就”,都是于史有证的。不过他是出于张居正“威权震主”的前车之鉴,把威权统统交还给皇上,让他亲操政柄,事事由他独断裁决。申时行的迁就为神宗的独断专行创造了条件,而不是为他的荒怠疏懒提供方便。从事实上讲,在申时行任内阁首辅的几年中,是神宗亲政以来最为繁忙的时期,事无巨细都要过问,根本谈不上荒怠疏懒;从逻辑上讲,申时行如果像严嵩一样专擅朝政,那么神宗才可以像他的祖父世宗那样,不理朝政,荒怠疏懒。

笔者以为,神宗怠于临朝,个中原因固然很多,但最主要的一条是他长期以来耽于酒色,以致疾病缠身,使他对于日理万机感到力不从心。非不为也,是不能也。所谓怠于临朝并非不理朝政的同义语,而且荒怠也有一个随着健康状况逐步恶化而不断加剧的过程。这种状况可以追溯到万历十四年(1586年),九月十六日以后神宗连日因病免朝,到三十日病情仍未好转,再次命司礼监传谕内阁,说他原本欲御门临朝,已于卯时(清晨)初刻准备动身,无奈“一时头昏眼黑,力乏不兴”。可见日前暂免朝讲期间“静摄服药”并无效果,仍然“身体

① 马楚坚《明政由治入乱之关键》,载吴智和主编《明史研究专刊》第5期(1982年),台北大立出版社。

虚弱,头晕未止”^①。礼部主事卢洪春为此特地上疏指出,陛下春秋鼎盛,精神强固,头晕眼黑等症皆非今日所宜有^②。

确实,神宗头晕眼黑、力乏不兴等病情一传出,臣下无不惊骇,也有人怀疑皇上托疾偷懒。其实是冤枉他了。他的暂免视朝日讲,是因病请假。这毛病拖到第二年,仍不见好转。这年二月初三日,神宗又派文书官传谕内阁:暂免经筵,原因是“连日动火,时作眩晕”^③。以后,神宗身体时好时坏,视朝日讲经常宣布暂免,但是只要身体状况允许,他还是朝讲如初。例如十五年三月初六日,神宗“圣体初安”,按规定视朝,百官上殿庆贺;随后又在皇极门暖阁召见申时行等三名内阁大臣议论朝政。神宗向三位大臣一见面就打招呼:“朕偶有微疾,不得出朝,先生每忧心。”^④又如十六年二月初一日,他按例到文华殿参加经筵,经筵完毕还兴致勃勃地与阁臣们讨论《贞观政要》、议论唐太宗与魏徵^⑤。不久旧病复发。头晕目眩这种毛病,不能动脑筋,视朝、日讲、批阅奏章当然难以胜任。十八年正月初一日,神宗为了雒于仁的奏疏召见申时行。申时行向他提出,皇上有病需要静摄,但也应该一月之中二三次或三四次临朝,处理重大政务。神宗听了并不恼怒,只是解释说:“朕病愈,岂不欲出!即如祖宗庙祀大典也要亲行,圣母生身大恩也要时常定省。只是腰痛脚软,行立不便。”^⑥十九年闰三月,神宗在病情稍微好转后,对内阁大臣谈起自己的健康状况时说:“原朕之疾,因火生痰成疾,故食少寝废,尝服药饵,未见瘳愈。以致庙享屡遣代行,朝讲久废。”^⑦同年九月他又向申时行谈及

①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十四年丙戌卷,九月,杖礼部主事卢洪春于阙庭革为民条。《明神宗实录》卷178,万历十四年九月己未。

② 《万历邸钞》万历十四年丙戌卷,九月,杖礼部主事卢洪春于阙庭革为民条。《明神宗实录》卷178,万历十四年十月丙寅。

③ 《明神宗实录》卷183,万历十五年二月庚午。

④ 同上书卷184,万历十五年三月癸卯。

⑤ 同上书卷195,万历十六年二月乙丑。

⑥ 申时行《召对录》。

⑦ 《明神宗实录》卷234,万历十九年闰三月壬申。

病情：“朕今年以来，因痰火之疾不时举发，朝政久缺，心神烦乱”^①，真实地流露出他当时久病不愈的心情。其后，王家屏、王锡爵辅政时期，情况仍不见好转，神宗仍是“面目发肿，行步艰难”^②。由于头晕目眩，视朝只能偶尔为之。

神宗在此后的二十多年中，处理朝政的主要方式是透过批阅奏疏、发布谕旨来进行。他始终牢牢地掌握着朝廷的大政方针，这从“万历三大征”的全过程可以看得很清楚。但廷臣们对于皇上深居内宫，无法一睹“龙颜”有所不满。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七月神宗传谕内阁：“朕自入夏以来，常中暑湿，身体屡生热毒，又头眩软弱，时享（郊庙）暂遣代行”^③，遭到贵州道御史许文造的批评：“顷岁以来，谓郊庙为常事，谓朝讲为虚文。”^④以后类似的批评接连不断。户部主事董汉儒说：“神圣御宇亦且二十三年，何始勤而终怠，国是日非。频年深宫，群臣罕能窥其面。”^⑤御史马经纶批评皇上“不郊天有年”，“不享庙有年”，“辍朝不御”，“停讲不举”^⑥。

万历二十四年七月十三日，仁圣皇太后陈氏病逝，按照常例神宗必须参加嫡母的丧礼。神宗又派遣使臣代行其事，理由仍是患病动弹不得^⑦。此事遭到廷臣更为严厉的责难，吏部左侍郎孙继皋说：古今大纲常必不可亏，国家大典礼必不可缺，冒昧圣明扶疾护送母后，以光圣人大孝，以慰寰海同情。吏科给事中戴士衡说：母子至情，送终大事，稍知义理者尚思竭僻踊哀送之情，以申无已之忧。奈何以内庭数步之地，顾靳一足之劳^⑧。官员们的批评并非没有道理，神宗则有苦难言。他一向以孝顺闻名，待仁圣皇太后恭谨备至，嫡母

① 《明神宗实录》卷240，万历十九年己巳。

② 《万历邸钞》万历二十年壬辰卷。

③ 同上书万历二十二年甲午卷，七月，庙享代行条。

④ 同上书万历二十二年甲午卷，七月，贵州道御史许文造言条。

⑤ 同上书万历二十三年乙未卷，五月，附录，户部主事董汉儒上言条。

⑥ 同上书万历二十四年丙申卷，正月，谕御史马经纶外任条。

⑦ 同上书万历二十四年丙申卷，九月，哭仁圣皇太后条。

⑧ 同上书万历二十四年丙申卷，九月，吏部左侍郎孙继皋言条，吏科给事中戴士衡言条。

的丧礼都难以参加,可见确实病重,“动履不便”并非托词。到了三十年二月,神宗的病情突然加剧,二月十六日紧急召见高级官僚,又单独召见内阁首辅沈一贯进入他的寝宫——启祥宫后殿暖阁,当着慈圣皇太后、太子及诸王的面嘱托后事,要沈一贯辅佐太子做个好皇帝^①,足以表明多年身患疾病的神宗身体已经虚弱到极点,否则决不会有此一场虚惊。自从这场虚惊后,神宗更加急于临朝了。正如沈一贯在一个奏疏中所说:“皇上居深宫之中,不见群臣,百姓可谓塞耳掩目,置人言于弗理。”^②字里行间流露出满情绪。这种状况从沈一贯时代到叶向高时代丝毫不见改变。叶向高不无感慨地说:“国家多事,朝政不行,臣沉浮其间,无所转移,实是有罪……然皇上深居日久,如天之穆无声嗅,听万籁之争鸣;如水之漫无堤防,任百川之自溃。典礼当行而不行,章疏当发而不发,人才当用而不用,政务当修而不修,议论当断而不断。”^③叶向高的深刻反省充分揭露了神宗怠于临朝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明史》卷240《叶向高传》说:“当是时,帝在位日久倦勤,朝事多废弛,大寮或空署,士大夫推择迁转之命往往不下,上下乖隔甚,廷臣部党势渐成……”优游林下的申时行在信中与叶向高谈及朝政,不胜感慨:“近时事体与往时大相悬绝,阁中开导斡旋止凭揭帖,往时或奉御札或令文书房口答,无中寝者。今答者什之二三,寝者什之七八,此一难也。往时六卿皆备,事体每相商榷,皆得与闻。今疏上报可绝无违驳,遂至不相关涉,此二难也。一时风尚率先,气节少年喜事,口语纷纭,前倡后随,党同伐异,徇之则不可胜从,违之则便相侧目,此三难也。”^④因此申时行不由惊叹:“方今国事艰危,人情险陂……而众论愈嚣,群情愈涣,少年阴有所拥戴以树私交,而阳有所抵排以淆公是。上下否隔,中外睽携。自古国家未有如此而能久安长治者。”^⑤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神宗的晚年,而且愈

① 《明神宗实录》卷368,万历三十年二月己卯。

② 同上书卷399,万历三十二年八月己卯。

③ 同上书卷510,万历四十一年七月丁卯。

④⑤ 申时行《赐闲堂集》卷38《答叶台山相公》。

演愈烈。

神宗晚年最后的岁月，是在辽东战事的忧虑与日益加重的疾病煎熬中度过的。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入夏以来，神宗身体始终不好。六月初六日他对内阁首辅方从哲说：“朕入伏以来，着湿熏蒸，不时腹泻，头目眩晕，身体发软。见今服药未愈，临御不便。”^①不能御朝，还得为辽事操心，这时他多么需要得力的内阁辅臣为他排忧解难。自从万历四十五年内阁次辅吴道南丁忧归里后，内阁辅臣只有首辅方从哲一人，而方从哲偏偏不是一个勇于任事的股肱之臣，当此多事之际畏缩不前。他因儿子方世鸿杀人遭巡城御史弹劾，索性借此机会乞求皇上罢官。不久，天上出现彗星，京师又有地震，方从哲向神宗上疏说，这些“妖象怪征”是他“奉职无状”的结果，在“痛自修省”的幌子下又想辞官^②。此举引来在朝官员们的嘲笑、蔑视，他的声望一落千丈。河南道御史熊化上疏弹劾方从哲辅佐无效，甚至私下庇护辽东督抚，使得辽东战事愈来愈糟糕。于是方从哲索性“攒纱帽”，称病在家，坚卧不出。神宗不能没有辅臣，劝慰他不必对言官的弹劾太过于介意：“方今国家多艰，须卿鸿猷匡济，共图化理，岂可以浮言坚欲求去！”^③

万历四十七年春节到了，正月初一日神宗照例又是免朝，这已是近二十年来的惯例了。方从哲还是率文武百官来到午门外举行庆贺典礼，礼毕后，又到仁德门致礼，然后向长期不见的皇上呈进一道奏疏。方从哲在奏疏中对近年朝政缺失——大僚半缺、言路几空——发了一通牢骚。神宗看了之后批示道：“所请补大僚、用言官，俟朕详览陆续简发……卿为首辅重臣，宜表率百僚，岂可托疾不出，国事何赖！”^④从去年十二月以来方从哲称病在家，逍遥了四十多天，致使内

① 《明神宗实录》卷 571，万历四十六年六月癸亥。

② 《明史》卷 218《方从哲传》。

③ 《明神宗实录》卷 577，万历四十六年十二月庚午。

④ 同上书卷 578，万历四十七年正月乙酉。

阁大门白昼紧闭辅臣揆席虚悬,无人理事^①。神宗不得不派鸿胪寺堂上官前往方府宣谕:“辅臣方从哲速出视事!”^②几天后方从哲才声称病痊,出来办公。及至杨镐在辽东大败的消息传来,礼部主事夏嘉遇以为辽事之坏方从哲难辞其咎,吓得方从哲不敢到内阁办公。直到神宗优旨恩留,才放下心来,入阁视事如故。为了减轻压力,方从哲希望皇上到文华殿召开九卿科道等官会议,共图保辽保京师之策。神宗派文书官到内阁传谕,因疾病缠身,无法出席文华殿会议,希望大臣谅解^③。以后方从哲又请求从速补充内阁成员,为此连上十几道奏疏,甚至在文华门候旨六天,还是不得要领。过了两天,神宗向方从哲解释,实在是由于病得不轻,无法批阅奏章,不得不拖延,“少俟朕稍愈,即旦夕详览简发”^④。方从哲实在沉不住气了,一反常态,改变以往那种虚与委蛇的态度,批评皇上并无真心实意:“辗转延误,日复一日,是皇上原无允补之意,不过借此以示羁縻耳。”^⑤矛盾已经尖锐到这种地步,神宗不便再拖,同意由吏部会推六七名候选人供他从中点用^⑥。过了几天,神宗点用了史继偕等两人,感到不太满意,把简用阁员的公文压住不发。方从哲接到的仍是老一套:“朕昨入夏以来,天气乍寒乍奥,以致腹痛泻痢,服药稍愈。近又连日阴雨,偶尔中暑,头目眩晕,动履艰难。各衙门章奏未经详览,见今服药调摄,俟朕少瘳,次第简发。”^⑦然而神宗的病始终不见好转,一直到他病逝,仍未正式任命史继偕等两名阁臣。

这时候的朝廷哪里还像朝廷,皇帝疾病缠身,朝政处于半瘫痪状态:内阁只有一人,部院堂上官只有八九人,科道官只有十几人,中央政府难以运作。这种状况引起官僚们的极大不满,内阁首辅方从

① 《明史》卷218《方从哲传》。《明神宗实录》卷578,万历四十七年正月己酉。

② 《明神宗实录》卷579,万历四十七年二月丁巳。

③ 同上书卷580,万历四十七年三月乙未。

④ 同上书卷581,万历四十七年四月辛巳。

⑤ 同上书卷582,万历四十七年五月癸巳。

⑥ 同上书卷582,万历四十七年五月丙申。

⑦ 同上书卷583,万历四十七年六月辛酉。

哲成为众矢之的。方从哲早就不想干，面对如此声势乐得顺水推舟，向皇上提出“尽夺臣官，放归田里”^①。神宗生怕政府完全瘫痪，只得自己承担责任，谴责言官，挽留方从哲^②。

万历四十八年春节过后，神宗的病情仍不见好转。四月初六日，神宗的皇后王氏病逝。四月十一日方从哲前往思善门哭临，然后到仁德门恭请皇上圣安，要太监转告面见的请求。少顷，太监口传皇上旨意，在弘德殿召见方从哲。方从哲随太监来到弘德殿皇上御榻边，但见皇上在御榻上侧身而卧。这是方从哲进入内阁八年来第二次见到皇上，他西向行四拜礼以后，君臣间展开了最后一次对话。

方从哲说：“圣体违和，外间不能尽知。昨闻御医传示，臣不胜惊惧。又值中宫皇后崩逝，圣心哀悼。伏望皇上宽慰圣怀，善加调摄，以慰中外臣民之望。”

神宗说：“朕知道了。国家多事，先生可尽心辅理。”

方从哲说：“臣蒙皇上厚恩，尚可图报，敢不尽力。”

神宗说：“朕自昨岁三月以来，时常动火，头目眩晕。五月后又中暑湿，肚腹不调，呕吐几次，脾胃受伤。至今不时泻痢，身体软弱。因泻多，下部肿痛难坐。又湿痰流注，右足痛，动履不利。每日文书俱朕亲览，但神思恍惚，眼目昏花，难以细阅。”由于久病虚弱，无力多说，便嘱咐身边太监：“都说与先生。”那意思是把病情一五一十全部告诉方从哲。待太监说完，神宗昂起头来对方从哲说：“先生试看朕容。”

方从哲跪行到御榻前仰视，见皇上果然消瘦得厉害，劝慰道：“皇上一身百神呵护，但加意调理，自然万安。”说完这些，方从哲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把平时积压的问题简要地向皇上提出：“如今辽东虏情紧急，又值皇后大礼，阁中只有臣一人，且十分病困，实难支持，望皇上将已点二臣即赐简用。”

神宗回答：“辽东的事，只因文武不和，以致如此。阁臣本已批

① 《明史》卷218《方从哲传》。

② 《明神宗实录》卷588，万历四十七年十一月甲申、丙申。

了,因朕寿节,文书多,不知安在何处,待查出即发。”

方从哲紧叮一句:“简用阁臣,乃今日第一要务,望皇上早赐查发。”

神宗说:“待朕体稍安即行。”方从哲还想再谈第三个问题,久病的神宗支撑不住,闭目就枕,口中喃喃道:“知道了……”渐渐入睡。方从哲只得叩头告辞^①。

方从哲返回朝房后,对同僚们谈起皇上的病情时说:“上自言病状甚悉,语多不能尽忆。”又说皇上头晕目眩日久,耳朵近于失聪,对话时每每回顾内侍,令他们复述,才能听清^②。可见神宗已经病入膏肓了。

进入七月,神宗病情恶化,有半个月没有进食^③。七月十七日,方从哲从御医那里获悉此事,立即上疏安慰,神宗已无力阅读,听太监转述后,口传旨旨:“朕因脾胃受伤尚未痊愈,昨稍尔劳烦,近又中暑湿蒸,前疾复作,见今服药调摄,神思不爽。其紧要各项公文俟朕疾稍瘳,即简发行。”病危的神宗仍念念不忘痊愈后重理朝政,他自己也没有料到,四天后竟一命呜呼。这时外廷的官僚也没有意识到皇上病情的严重性,科道各官叩阙请对,御史左光斗对方从哲说:“宜率百官问安。”方从哲答:“上讳疾,即问,左右不敢传。”给事中杨涟说:“昔文潞公问宋仁宗疾,内侍不肯言,潞公曰:‘天子起居,汝曹不令宰相知,将无他志?下中书省行法。’公诚日三问,不必见也不必上知,第令宫中知廷臣在门。且公当直宿阁中。”方从哲答:“无故事。”杨涟说:“潞公不诿史志聪乎,此何时,尚问故事。”方从哲避而不答^④。这场争论实属多余。几天后的七月二十一日,宫中传出“上疾大渐”的消息。英国公张惟贤、大学士方从哲、吏部尚书周嘉谟、户部尚书李汝华、兵部尚书黄嘉善、代理刑部尚书张问达、代理工部尚书黄克纘、礼部右侍郎孙如游等人,慌忙赶到弘德殿,神宗勉励大臣们“用心办事”。吏部尚书周嘉谟不失时机地向皇上提出用人的请求,

①② 《明神宗实录》卷 593,万历四十八年四月戊午。

③ 李逊之《泰昌朝记事》卷 1,万历四十八年。张浚《庚申纪事》。许熙重《宪章外史续编》卷 12《泰昌注略》。

④ 《泰昌朝记事》卷 1,万历四十八年。